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第7卷 ★★★★★

主编 / 潘懋元 史秋衡



科学出版社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系列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资助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第7卷 ★★★★★

主编 / 潘懋元 史秋衡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第7卷 / 潘懋元, 史秋衡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03-052495-9

I. ①中… II. ①潘… ②史…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8219号

责任编辑: 付 艳 / 责任校对: 刘亚琦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楠竹文化
联系电话: 010-64033934
E-mail: fuya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50 000

定价: 7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编委会

(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玉琨 华东师范大学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

刘海峰 厦门大学

潘懋元 厦门大学

史秋衡 厦门大学

王洪才 厦门大学

邬大光 厦门大学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

杨德广 上海师范大学

杨广云 厦门大学

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

序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主办的学术集刊。集刊依托厦门大学高教中心 / 教研院的高水准高等教育研究与交流平台，坚持“创新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探寻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研讨高等教育重大问题，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以高质量的中外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为特色，探讨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

本卷包括四个学术专栏。第一专栏为高等教育发展，内容涉及世界社会理论、高等教育与美国的平权运动、大学科技园创新生态系统融合发展模式等。第二专栏为现代大学制度，论文涉及网络大学与实体大学、陈嘉庚与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教授治校、现代大学制度治理模式、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第三专栏为高校人才培养，包括大学生参与服务学习及其社会责任感发展、农村女大学生的选择困惑、大学招生综合评价、教师教学行为与学生学习行为的关系等。第四专栏为重要学术会议，内容包括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会议综述及 2015 年“山海论坛”教育领域分论坛会议综述。

衷心感谢诸位专家学者不吝赐稿，他们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现代大学制度、人才培养等的深入探讨，将有力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快速发展。

目 录

——高等教育发展——

世界社会理论：新制度理论在世界现象研究中的应用 / 阎凤桥 / 003

从高等教育视角看美国的平权运动 / 刘 丽 丽 / 017

大学科技园创新生态系统融合发展模式研究：硅谷、筑波科学城和
清华科技园之比较 / 钟之阳 蔡三发 / 029

——现代大学制度——

网络大学会替代实体大学吗？——一个现象学的考察 / 王洪才 / 045

合理与现实：现代大学治理的逻辑 / 徐晓丹 / 058

陈嘉庚对抗战时期厦门大学的影响及其实现路径 / 石慧霞 / 070

“教授治校”的现实意义及其出路 / 刘隽颖 / 082

我国现代大学治理模式研究 / 刘 慧 / 095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之问题及对策分析——中国梦时代高等教育的必
破之茧 / 魏娜娜 / 120

——高校人才培养——

大学生参与服务学习及其对社会责任感发展的

影响 / 陆根书 胡士亮 / 135

规训与抗拒:农村女大学生的选择困惑——基于个案访谈的

研究 / 武毅英 郑育琛 / 184

大学招生“综合评价”中审核学生课外活动参与程度的

重要性 / 常桐善 / 196

大学教师教学行为对学生学习行为影响研究 / 谢 妮 张湘韵

万 华 / 211

——重要学术会议——

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反思与重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

学科建设座谈会”会议综述 / 柯安琪 / 227

稳步提升大学治理水平 切实改进高等教育质量——2015 年“山海论坛”

教育领域分论坛会议综述 / 陈恒敏 柯安琪 / 238

高等教育发展

世界社会理论：新制度理论在 世界现象研究中的应用

阎凤桥

摘要：在后工业社会里，专业人员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扮演着“脚本作者”（script writer）的角色，提出超验的社会发展理念，制定和推广他们认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这些理念和模式的作用下，个体的权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和彰显，组织朝着正式化的方向发展，民族国家变成构建国际社会的积极合作者，世界变成一个具有“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特征的社会，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行。当理性观念和发展模式由专业人员从发源地（先发内生型国家）传播到接受地（后发外生型国家）时，常常会出现模式与后者的实际需求不甚适应的情况。在“松散耦合”（loosely coupling）机制作用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制度形式上的趋同与内容实质上多样的图景。这是世界社会理论透镜让我们看到的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格局及其存在的张力。

关键词：世界社会 新制度理论 现象学 文化渗透 松散耦合

在不同的理论透镜下，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不同面相。是否可以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社会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世界社会理论（world society theory）提出之前，鲜有其他理论将世界视为一个社会，因为从一般意义上看社会与国家（state）相并存。对于世界而言，并不存在着一个类似于国家政府的世界政体（联合国是一个不具有强制力的国际机构，无法与一个国家政府相提并论），因此也不宜将世

界视为一个社会。依循此理,政治学实在论者将世界看做是国家间利益纷争、弱肉强食的无政府状态,世界系统论者将世界看做是一个缺少统一管制政体的混合经济体(沃勒斯坦,1998)。世界社会理论与众不同地将世界视为一个社会的理由何在呢?这些理由能否成立?

要想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对社会进行一个定义。社会是社会成员自发和自主管理、形成一定秩序的系统。如同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看到美国普遍存在着自由结社情况而认为美国社会民主力量强大一样(托克维尔,2004),世界社会理论的提出者约翰·梅耶(John Meyer)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着类似于美国自由结社的现象,这就是在20世纪兴起的各种专业团体和志愿组织,如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世界野生生物基金组织(Wildlife Fund International)、全球语言改革促进机构(Esperanto)等,它们将某些理性观念从一地传到另一地(往往是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并且付诸实践,形成了没有政府(stateless)强力维持下的世界秩序。这些具有“通用产品”(universal goods)或者“超验产品”(transcendental goods)属性的抽象理念,变为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先验信条,指导着人们去建设和改造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界具有社会的面相。

一、世界社会理论的源起

世界社会理论是新制度理论的一个分支,或者说它是新制度主义被应用于解释世界现象的一种理论学说。该理论由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约翰·梅耶及其追随者创立,被广泛地用来解释各种世界范围内的制度扩散现象。要想了解世界社会理论的起源以及与其他理论范式之间的异同,需要先简要地回顾一下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或者说世界社会理论提出的社会及学术史背景(Meyer,2009)。

社会科学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产生的。它在建立之初,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中一种倾向是将人类活动视为高度制度化的。在农业社会中,农人的行为主要是按照祖先留下的传统和习惯办事。农人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无甚变化,个体行为为社会制度所

束缚，不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被深深地“嵌入”（embedded）在集体文化模式中。在这种背景下，传统、习俗等内容成为社会科学家们的重点，他们采用“演化模式”（evolutionary model）来刻画人类文化和习惯的孤立性、多样性及其随时间的缓慢变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采取这种倾向的社会科学具有制度主义的特征，即今天所谓的“老制度主义”（old institutionalism）。

社会科学的另一种理论倾向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西方国家先后在 18、19 世纪完成了工业化，20 世纪更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纪。在现代化进程中，基于血缘的部族被基于契约的社会组织形式所替代，现代的农场、工厂、医院、学校、政府机构应运而生。科技进步、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福利国家、义务教育、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建立等，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将人的主体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旋律，被加以讴歌与颂扬，也被付诸实践。在上述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科学的另外一种倾向性，它将人类视为可以有目的地利用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来改造世界的理性动物，因此人不再是习俗的产物，他是有胜任力的“行动者”（actor）。采取这种倾向的社会科学具有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取向的特点，是某种意义的“去制度主义”（de-institutionalism）。

制度主义与去制度主义两种学术倾向相较，后者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主导范式。在 20 世纪后半叶，“习惯”（habit）从社会科学的术语中退隐，而“行动者”（actor）变为一个中心词。有人做过统计，在美国社会学三大期刊上，以“actor”或者“actors”为关键词发表的论文数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理论的构建也从以集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个体为中心。在学科分化过程中，只有人类学、历史学继续关注嵌入一定文化中的原始社会形态。相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多数学科则关注“现代性”（modernity）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行动者取向的自由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制度被看做是惰性与非理性的根源，制约着行动者能动性的发挥，原始和落后的社会制度可以在教育和理性力量作用下得以进化。这种状况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新制度理论的出现才发生了改观。

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建立在行动者取向基础上过于乐观的社会发展理论,在指导社会实践方面并没有取得事先预想的那么积极的效果;相反,社会实践与理论预期常常大相径庭,在理性目标与现实效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在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在几乎每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都不约而同地重新开始重视制度问题,提出了所谓的“新制度理论”(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在组织研究中,有两篇研究文献开创了新制度理论的先河。第一篇是梅耶和罗万于1977年发表在《社会学期刊》上的“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一文(Meyer and Rowan, 1977)。他们认为,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也同样受到制度的约束。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习俗和传统,现代社会的制度力量来自于政府、专业团体和文化观念。他们将组织的制度环境定义为文化性和弥散性的,在它的作用下,组织的结构化并非来自于对命令的服从,而是来自于对已有“脚本”(scripts)的采纳。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可被看做是一种文化模式,将手段——目标理性逻辑进行了编码,嵌入制度环境中的实体采纳环境中的文化模式。梅耶在组织研究中提出的新制度主义文化因素取向,一直延续到后来世界社会理论的建构中。第二篇是迪马奇奥和鲍威尔于1983年合作撰写的“铁的牢笼新探讨:组织域的制度趋同性和集体理性”一文,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他们提出了存在着“规则同型”(regulative isomorphism)、“规范同型”(normative isomorphism)和“模仿同型”(mimetic isomorphism)三种机制,其中模仿同型与梅耶的文化制度因素的含义是一致的(DiMaggio and Powell, 1983)。上述两篇经典文献,引起了组织研究范式的转变,重新将制度带回到社会学研究中,从而奠定了“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理论体系的基础。综上所述,社会学中新制度理论建立在下面这样一个核心思想基础上,即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文化含义和组织形式渗透到处于地方情景下的行动者及其行为表现中(Jepperson, 2002)。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新、老制度理论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包含着不同的含义,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老制度理论将个人看做是嵌入于一定的文化和习俗中,没有行动的自由,而新制度理论将行动者看作具

有一定的能动性，制度具有两面性，它既为行动者提供发展机会，同时也约束着其行动选择。从研究的关注点看，老制度理论关注环境对组织影响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新制度理论则关注其普遍性和相似性。

随着新制度理论的建立，组织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了一个连续“图谱”（spectrum）。如图1所示。在图谱的一端是理性学派，它关注行动者的自由和理性选择。在图谱的另一端则是制度学派，它关注制度对于行动者造成的约束和放大效应，行动者的行为是一种“仪式化”（ritualized）的理性行为，这种仪式化是由于行动者模仿外部环境造成的，是一种形式上的理性，其实质是反理性的。如果说理性人是在独立于他人的“效率”（efficiency）机制作用下行为的，那么制度人就是在“合法性”（legitimacy）机制作用下行为的。这里，合法性机制是指组织满足制度环境要求的作用机制。



图1 社会科学理论理性和制度范式

进而言之，合法性机制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工具性（instrumentality）、适当性（appropriateness）和正统性（orthodoxy）三种形式（Scott，2008）。如图2所示。工具性和适当性属于“实在论”（realist）的制度主义取向，它们将行动者看做是“关系密切的实体”（hard-wired entity），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Meyer，2009）³⁹。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就主要位于这一侧，经济产权、国家主权就是两个典型实例。正统性属于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的制度主义取向，建构主义就位于这一侧。在现象学制度主义看来，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是由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完成的。梅耶提出的世界社会理论，就属于现象学制度主义范式，即从文化渗透角度讨论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



图2 社会科学理论实在论和现象学范式

二、世界社会理论内涵

新的社会理论的提出，往往是由于以往的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并且新提出的理论可以弥补解释上的空白与不足。作为后来者的世界社会理论亦是如此。梅耶列举下面一个例子，说明世界社会理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不同。对于女性受教育机会的扩大这一事实，实在论试图从人口变化、出生率的降低、有效生产机械的采用等方面予以解释，另外又从需求角度提出，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要接受过一定教育程度的女性加入是促进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原因。但是，所有这些考虑都无法有效地解释，即使在最不可能的生产领域和最不开化的国家，女性上学机会仍然在扩大。从世界社会理论看，女性受教育机会扩大是由于女性权利（人权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扩大的结果，即将女性接受教育视为一种正当性的做法，不由功能需求所决定（Meyer, 2009）⁵⁴。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新几内亚为什么要建立大学，乌干达为什么有数以千计的正式组织，刚果为什么成立科学机构，洪都拉斯为什么要提高会计工作的透明度等，世界各地为什么要使个体成为“符号上被承认和赋权的个体”（赋予同性恋者以相同的权利就是一个具象表现）（Meyer, 2009）⁴⁷。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很难给出恰当的解释，世界社会理论从特定的文化视角出发，有助于解释功能主义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的某些现象。

如前所述，世界社会理论是社会学新制度理论中侧重于从现象学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的一个理论分支。换句话说，世界社会理论主要讨论文化机制作用下的行动者（包括个体、组织和民族国家）模仿行为，制度扩散就是通过模仿机制实现的。可以说，现象学的制度主义与美国的学术范式相去甚远，而与欧洲的学术传统比较接近。在建立世界社会理论过程中，梅耶从欧洲学者那里吸收了有益的思想，伯格与卢克曼（2009）的著作《现实的社会构建》中有关共同理解的“神圣苍穹”（sacred canopy）就是一例。从文化意义上看，世界上的有效活动被专业团体“编辑和翻译成一些模式”（edited and translated models），这些专业组织发挥着“脚本

作者”(script writer)的功用,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推广他们认为成功的模式。

世界社会理论属于后功能主义学派,它从文化角度为社会下定义。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社会,实质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而不像实在论那样将社会看做是由行动者在功能上相互依赖而形成的结合体(Meyer, 2009)³⁶。因此,从文化角度看,虽然缺少一个世界性的政府,但是仍然可以把世界看做是一个社会。所谓世界社会,就是一个“假想的世界”(hypothetical worlds),它由一些备择的社会秩序构成,而社会秩序源自欧洲在启蒙运动期间和19世纪在宗教、科学、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取得的智识上的突破。对于“世界本该是怎样”的构想为“世界是什么”提供了可能和直接有用的参照系,并且还提供了形塑这个世界的模板(Drori & Krücken, 2009)³。事实表明,世界文化变得越来越“理论化”(theorization),即超越地方和特殊情形的普遍和抽象的模式可以被转化为行动。这种备择世界秩序提供了可能的历史发展路径,但是,每一条路径从本质上讲都是先验和反事实的。

笔者试图通过图3勾画出梅耶世界社会理论中关于世界社会的建立过程。这张图的时代背景是19—20世纪,即世界社会建立的时代。专业人士和志愿组织是世界社会的始作俑者,他们提出世界发展的抽象理念,建立现代化的“普适”(universal)理论模式。作为非行动者的“他者”(others),他们并不亲自采取行动,而是将这些理念和模式介绍给处于特定情形下的行动者。在文化渗透机制(梅耶将文化扩散过程形象地比喻为“乙醚”的扩散过程)作用下,行动者将这些理念和模式视为“理所应当”(take for granted),并将它们付诸实践。在文化制度作用下,行动者既可能受到约束,也可能被“放大”(expanded)。很有趣的是,“行动者”对应的英语词汇是actor,它除了“行动者”的含义外,另外一个解释是“演员”,演员的表演是按照“脚本作者”(script writer)和导演的编排进行的。因此,借用上面的双关语,行动者的行动看似是自由的,其实是在按照“脚本作者”(这里指专业人士)指定的方式进行的。在行动者实践过程中,“松散耦合”(loosely coupled)机制在起作用,它产生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一个国家的某项制度与该国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松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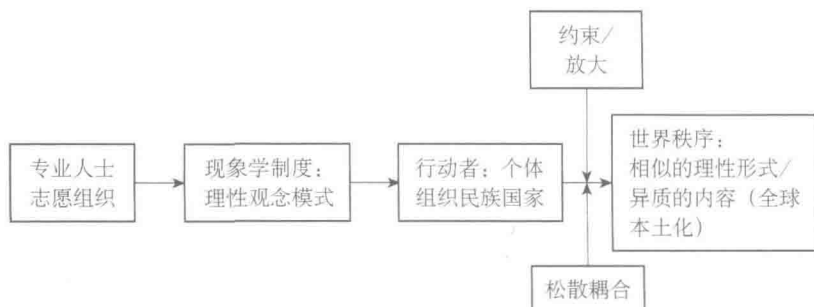


图3 世界社会的形成过程

耦合，使得这项制度可以受到来自遥远国际社会的影响，后者的影响甚至可以大于前者的影响；第二，使得某一项制度的形式与实质相对分离，常常是形式上的相似性掩盖着内容上的差异性。在制度扩散机制与松散耦合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形：制度形式上的相似性和制度实质上的多样性。具体到世界社会而言，就是理性观念（人权、教育、环境等）和模式（市场、法治、民主等）被广泛地采纳，但是在不同国家却收到不同的效果。当某一项制度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过程中，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做法时，先发内生型的制度难以在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彻底落户，造成“名”（形式）与“实”（内容）之间的分离，使得某些源于发达国家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因此，我们不仅看到了形式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而且还看到了形式与内容相分离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

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社会理论的含义，需要将它与其他相近的理论进行一些对比。从形式上看，世界社会理论与现代化理论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基于同样的现代社会发展背景提出来的，即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特征在逐渐消失，而现代组织形式变得越来越普遍，个体从传统关系（家族、社群）约束下解放出来，在法律和其他社会制度的保护下自由地行为，普遍主义行为原则取特殊主义行为原则而代之。但是，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不容忽视：现代化理论是从功能主义角度捕捉并解释现象，而世界社会理论则是从意识形态（现象学）角度进行。除了梅耶之外，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是研究世界问题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在研究世界发展状况